

另辟蹊径

“偷”出的畅销书单

□ 严 慧

德国戈尔德曼出版社开了一些书店,令书店工作人员苦恼不已的是,每年都有大量图书丢失。为了对员工起到警示作用,每年年终,书店负责人都会把这些丢失图书的名称和数量登记在一份表格上,高高地悬挂在书店里,以提醒员工们工作时打起精神,时时提防那些“爱书的小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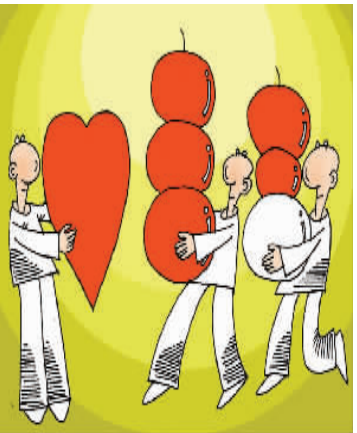
一天,出版社企划经理费力克斯到一家书店办事时,偶然看到了这张表格。他饶有兴趣地盯着表格细看,脑中突然迸发出一个灵感。对,就这么办!回到出版社后,他立即做了一份详细的宣传策划案,提交给相关负责人。方案很快获得批准,戈尔德曼出版社开始有计划地增印那些被偷次数最多的图书。

不久之后,享誉世界的法兰克福国际书展开幕了。在书展上,每家参展的出版社都想尽办法、用尽各种宣传手段来推销自己的图书。戈尔德曼出版社自然也不例外,但他们的方法却别具一格——在展位最醒目处,他们贴出了一份特殊的榜单:“被偷盗次数最多的十大德文书籍”,正是费力克斯根据书店里的那份表格整理而成的。不出所料,这份书单一下子吸引了大量书商前来订货,戈尔德曼出版社成为那届书展上最大的赢家,用很少的广告投入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戈尔德曼出版社成功的道理很简单——书商们可能不相信出版社的广告,却相信读者的选择:被偷次数最多的图书,通常是读者最喜欢的,也必然会成为最畅销的书。

丢书是坏事,费力克斯只是换了一个角度,便把坏事变成了商机。

画说万象



只有真诚地付出,才能得到别人的尊敬和支持



优秀的员工不一定最渊博,却能在岗位上做一颗最合适的铆钉



忘记过去,漠视恩情,就等于撕去了人生履历的其中几页
毕传国 作

智慧讲义

民俗文化,一卷生活智慧书

□ 王韶华

我们生活在文化中。在中华大地上,众多民族创造、享用和传习着丰富多彩的民风民俗,反映了他们生产生活中所形成的一系列物质的、精神的文化现象。钟敬文曾指出:“民俗是一种民间传承文化,它的主体部分形成于过去,属于民族的传统文化,但它的根脉一直延伸到当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伴随着一个国家或民族民众的生活继续向前发展和变化。”

我们触手可及的饮食、服饰、居住、交通等诸多生活范畴,岁时、节日、娱乐、活动,乃至个人、家庭、家族、民族的组织运行形式,无不在民俗文化生动而丰广的智慧中得以体现。

《周礼》说:“俗者习也,上所化曰风,下所习为俗。”指像风一样刮动,遍及上下左右四方,人人传习,并自觉教化而形成民俗。《晏子春秋》说得中肯,“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可见,由于地域环境、历史发展和伦理道德的影响,民俗文化因地而生,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

例如,满族祖先生活在东北“白山黑水”的广阔地区,旗袍是他们的传统服装,狩猎是主要的生活方式。他们善骑乐射,驰骋于山林,被誉为“弓马之民”。蒙古族逐水草而居,住“毛毡帐裙”的蒙古包,“食唯肉酪”。每年夏秋之间举办“那达慕”大会,赛马、射箭、摔跤。藏族聚居在

人们在长期的农业生产中,探索季节气候和农事的关系,随着季节、时序的变化,形成了不同的民俗习惯。

《礼记·郊特性》有篇《蜡辞》记载:“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勿作,草木归其泽。”这是十二月终了氏族部落酋长在祭奠上的祝词,祈求神灵保佑,风调雨顺,不稼丰收。立春是先民的重要活动,早在周代天子亲率三

在平淡、琐碎、矛盾交错的日子里,创设快乐、祥和的节日,凸显了文化巨大的生命力量和生活意义。

农历正月初一,春节。《诗经》记载,古代过年喝“春酒”,祝“改岁”,晋朝时开始放爆竹。“年”的最初含义指谷的生长周期,人们过年,就是希望拥有和享用幸福的生活。今天,希望国上下的春节活动,在深厚的文化积淀中,注入了新的意义,昭示着“除旧布新”的精神面貌和时代风

民俗文化在生活中创造、通行和传习,其根本在于民间生活。一个民族,往往拥有崇尚美好的共同行为。

这种心理与行为,在与生活最为密切相关的衣食住中皆有体现。

先说衣。仫佬族把大自然的馈赠穿到了身上,他们的手工编织很有特点,很早就能用茅草编织“茅草被”,用麻织成“娘子布”,用桑树皮织“圈布”,用羊毛编织厚重斑澜的筒裙,用丝、麻、棉织成“五色绸布”。壮族妇女用棉纱为经,五色丝线为纬,织成美丽的壮锦。苗族服饰也令人叫绝,款式多,花样奇,流行“裙多为美”的风俗,有的在婚礼或节日竟穿上三四十层裙子。

民以食为天。怒族喜欢吃石片烤饼,将调成稀糊的麦面或者荞面倒在烤热的石板上烤制,香甜酥脆。仫佬族有一种民族风味食品,



地方民俗:和而不同

“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种耐寒抗旱的青稞,牧放牦牛,饮食青稞酒、酥油茶和“风干肉”,随身带着木碗和小刀。藏族文化和习俗影响深远,《格萨尔王传》是世界最长的史诗,藏戏、歌舞和藏画都有独特的风格。民俗文化显现了民族的特点,强化了民族精神,塑造了民族品格。

“五十六个星座,五十六枝花,五十六族兄弟姐妹是一家。”五十六个民族统一于整个中华民族之中,其纷呈各异的民俗文化构成中国民俗文化的整体。各族人民历经五千年文明



岁时民俗:随天应人

公九卿诸侯大夫去东郊迎春,鞭春牛以示劝农,祈求丰收。此后世世代代都举行全民的迎春活动,不少地方要向长者拜谒,叫“拜春”。全家围坐吃春饼,以祝家庭和睦,叫“咬春”。还有“村田乐”的娱乐活动被称为“唱春”,可见迎春活动之丰富多彩。



节庆民俗:乐在其中

尚。

清明节不仅是农事的节令,也是富于诗意的传统节日。人们扫墓,缅怀先人,认祖归宗,在祭祖行孝道的感怀中,弥漫人性的温度。这一天,人们也在郊外踏青而悟道,人心清明。今人与古人、生者与逝者、人与自然之间进行多重沟通与交流,饱含着对



生活民俗:崇尚美好

用紫萱草、红草、黄花、枫树叶等汁液,把糯米染成紫、红、黄、黑,加上原来的白色,制成色味俱全的五色糯米饭。

在住方面,侗族别具一格。侗乡素有“杉海”之称,侗族有个习俗,每当儿女出生,就要种植杉木,18年后长成材,建造新房,作为婚嫁之用。侗族村寨依山傍水,杉木建成的木楼有二三层的,有四五层或几幢连在一起的,还有依据河边陡坡建造的独特的吊脚楼。最具盛名的“鼓楼”是侗族的标志,逢年过节人们聚集在楼前唱歌跳舞,所谓“吹彻芦笙岁义终,鼓楼围坐话年丰”。鼓楼高达13层,飞阁重檐,气势峭拔,吸收了中国古代亭台楼阁建筑



寻找新的乐土,走到青海驯化时,白骆驼在一眼清泉边变成了化石,他们冥冥中悟到要找的居地就在眼前,于是便在这里安家落户。白骆驼成了撒拉人心中的吉祥物、美好理想的象征。再譬如龙的图腾信仰,上世纪七十年代山西出土蟠龙图形陶具,代表黄河中游地区龙山文化类型。后在内蒙古出土大型玉龙,属红山文化晚期。八十年代引起轰动的是河南西水坡发现的蚌壳龙图案,属仰韶文化作品。这些龙造型各异,产生年代、地点不同,但都传达和表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奋发腾飞的文化精神。这些充分说明,民俗文化只有异中求同,和而不同,才能承前启后,发扬光大。

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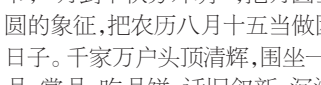
可见,中国最根本的民俗文化认同“天”,顺乎天意,也就是适应与遵循大自然的规律,保持和它的一致、和谐。天和人类社会具有密切关系,天人视为一体,不仅有物质、自然上的相连,同时还有精神上的相通,倡扬“以人为本”思想,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实现“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从而生活在和谐美满的环境中。



及至二月初二,是传说中龙王抬头的日子,“金豆开花,龙王升天,兴云布雨,五谷丰登。”北京乡民用石灰西地,自门外弯弯曲曲一直洒到厨房,绕水缸洒上一周,叫做引龙回,意思是引龙回来降服百虫。三月三为上巳节,农民上土谷祠祭神,祈求本年五谷丰登,



人间大爱的珍视呵护,从而体悟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观。人们也重视中秋节,“月到中秋分外明”,把月圆当做团圆的象征,把农历八月十五当做团圆的日子。千家万户头顶清辉,围坐一起,祭月、赏月,吃月饼,话旧叙新,沉浸在无限的天伦之乐之中。远在异乡的游子,“抬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借明月寄



钱穆在谈论中国文化发展问题时指出,中国文化乃由中国民族独创,故其文化演进,四五千年来常见为一脉相承,传统不辍。他引用《易经》“可大可久”的观点说明,中国文化开始就摆在一个大局面上,经历绵延了很长时期。中国民俗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部分,“成为此体之一种根茎,渐渐生长而圆成”。可以肯定地说,民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根基,它关乎普通人民群众生产生活过程中所进行的一系列物质的、精神的文化现实,它有广大的生活应用意义和影响人生的审美价值。



的精髓,又突破了塔楼建筑的常规,堪称中外建筑中的杰作。

钱穆在谈论中国文化发展问题时指出,中国文化乃由中国民族独创,故其文化演进,四五千年来常见为一脉相承,传统不辍。他引用《易经》“可大可久”的观点说明,中国文化开始就摆在一个大局面上,经历绵延了很长时期。中国民俗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部分,“成为此体之一种根茎,渐渐生长而圆成”。可以肯定地说,民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根基,它关乎普通人民群众生产生活过程中所进行的一系列物质的、精神的文化现实,它有广大的生活应用意义和影响人生的审美价值。



李善长笑了,他问大儿子:“你还说李家庄的人可恶吗?”

大儿子挠着头,嘿嘿笑着:“上次是挺可恶的,这次怎么这么友善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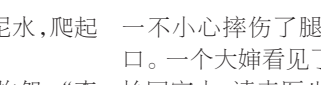
李善长说:“大善大恶的人,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都和这李家庄的村民一样,是些普通人,既有小善,也有小恶。你给他一个善的契机,他就表现为善;你给他一个恶的契机,他就表现为恶。所以说,恶要原谅,善要引导。”

李善长又问大儿子:“你把一担桃子丢在树荫下不管,还怪别人来偷吗?”

两个儿子听了,恍然大悟。

每个人身上都既有善的种子,也有恶的花,但最终结出什么样的果子,关键要看你给他一块什么样的土壤。一个团体管理者,最大的责任,就是要完善体制,尽量为人们提供向善的环境,减少为恶的机会。

二儿子千恩万谢地回到了家里,把经过告诉了李善长。



李善长笑了,他问大儿子:“你还说李家庄的人可恶吗?”

大儿子挠着头,嘿嘿笑着:“上次是挺可恶的,这次怎么这么友善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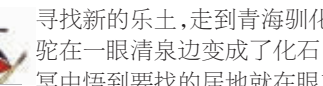
李善长说:“大善大恶的人,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都和这李家庄的村民一样,是些普通人,既有小善,也有小恶。你给他一个善的契机,他就表现为善;你给他一个恶的契机,他就表现为恶。所以说,恶要原谅,善要引导。”

李善长又问大儿子:“你把一担桃子丢在树荫下不管,还怪别人来偷吗?”

两个儿子听了,恍然大悟。

每个人身上都既有善的种子,也有恶的花,但最终结出什么样的果子,关键要看你给他一块什么样的土壤。一个团体管理者,最大的责任,就是要完善体制,尽量为人们提供向善的环境,减少为恶的机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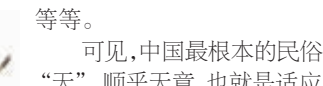
二儿子千恩万谢地回到了家里,把经过告诉了李善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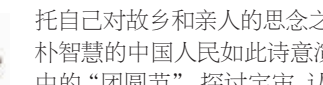
寻找新的乐土,走到青海驯化时,白骆驼在一眼清泉边变成了化石,他们冥冥中悟到要找的居地就在眼前,于是便在这里安家落户。白骆驼成了撒拉人心中的吉祥物、美好理想的象征。再譬如龙的图腾信仰,上世纪七十年代山西出土蟠龙图形陶具,代表黄河中游地区龙山文化类型。后在内蒙古出土大型玉龙,属红山文化晚期。八十年代引起轰动的是河南西水坡发现的蚌壳龙图案,属仰韶文化作品。这些龙造型各异,产生年代、地点不同,但都传达和表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奋发腾飞的文化精神。这些充分说明,民俗文化只有异中求同,和而不同,才能承前启后,发扬光大。

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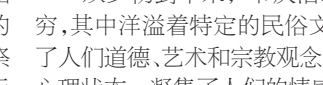
可见,中国最根本的民俗文化认同“天”,顺乎天意,也就是适应与遵循大自然的规律,保持和它的一致、和谐。天和人类社会具有密切关系,天人视为一体,不仅有物质、自然上的相连,同时还有精神上的相通,倡扬“以人为本”思想,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实现“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从而生活在和谐美满的环境中。



及至二月初二,是传说中龙王抬头的日子,“金豆开花,龙王升天,兴云布雨,五谷丰登。”北京乡民用石灰西地,自门外弯弯曲曲一直洒到厨房,绕水缸洒上一周,叫做引龙回,意思是引龙回来降服百虫。三月三为上巳节,农民上土谷祠祭神,祈求本年五谷丰登,



人间大爱的珍视呵护,从而体悟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观。人们也重视中秋节,“月到中秋分外明”,把月圆当做团圆的象征,把农历八月十五当做团圆的日子。千家万户头顶清辉,围坐一起,祭月、赏月,吃月饼,话旧叙新,沉浸在无限的天伦之乐之中。远在异乡的游子,“抬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借明月寄



钱穆在谈论中国文化发展问题时指出,中国文化乃由中国民族独创,故其文化演进,四五千年来常见为一脉相承,传统不辍。他引用《易经》“可大可久”的观点说明,中国文化开始就摆在一个大局面上,经历绵延了很长时期。中国民俗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部分,“成为此体之一种根茎,渐渐生长而圆成”。可以肯定地说,民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根基,它关乎普通人民群众生产生活过程中所进行的一系列物质的、精神的文化现实,它有广大的生活应用意义和影响人生的审美价值。



的精髓,又突破了塔楼建筑的常规,堪称中外建筑中的杰作。

钱穆在谈论中国文化发展问题时指出,中国文化乃由中国民族独创,故其文化演进,四五千年来常见为一脉相承,传统不辍。他引用《易经》“可大可久”的观点说明,中国文化开始就摆在一个大局面上,经历绵延了很长时期。中国民俗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部分,“成为此体之一种根茎,渐渐生长而圆成”。可以肯定地说,民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根基,它关乎普通人民群众生产生活过程中所进行的一系列物质的、精神的文化现实,它有广大的生活应用意义和影响人生的审美价值。



李善长笑了,他问大儿子:“你还说李家庄的人可恶吗?”

大儿子挠着头,嘿嘿笑着:“上次是挺可恶的,这次怎么这么友善呢?”

李善长说:“大善大恶的人,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都和这李家庄的村民一样,是些普通人,既有小善,也有小恶。你给他一个善的契机,他就表现为善;你给他一个恶的契机,他就表现为恶。所以说,恶要原谅,善要引导。”

李善长又问大儿子:“你把一担桃子丢在树荫下不管,还怪别人来偷吗?”

两个儿子听了,恍然大悟。

每个人身上都既有善的种子,也有恶的花,但最终结出什么样的果子,关键要看你给他一块什么样的土壤。一个团体管理者,最大的责任,就是要完善体制,尽量为人们提供向善的环境,减少为恶的机会。

二儿子千恩万谢地回到了家里,把经过告诉了李善长。



寻找新的乐土,走到青海驯化时,白骆驼在一眼清泉边变成了化石,他们冥冥中悟到要找的居地就在眼前,于是便在这里安家落户。白骆驼成了撒拉人心中的吉祥物、美好理想的象征。再譬如龙的图腾信仰,上世纪七十年代山西出土蟠龙图形陶具,代表黄河中游地区龙山文化类型。后在内蒙古出土大型玉龙,属红山文化晚期。八十年代引起轰动的是河南西水坡发现的蚌壳龙图案,属仰韶文化作品。这些龙造型各异,产生年代、地点不同,但都传达和表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奋发腾飞的文化精神。这些充分说明,民俗文化只有异中求同,和而不同,才能承前启后,发扬光大。

等等。

可见,中国最根本的民俗文化认同“天”,顺乎天意,也就是适应与遵循大自然的规律,保持和它的一致、和谐。天和人类社会具有密切关系,天人视为一体,不仅有物质、自然上的相连,同时还有精神上的相通,倡扬“以人为本”思想,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实现“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从而生活在和谐美满的环境中。



及至二月初二,是传说中龙王抬头的日子,“金豆开花,龙王升天,兴云布雨,五谷丰登。”北京乡民用石灰西地,自门外弯弯曲曲一直洒到厨房,绕水缸洒上一周,叫做引龙回,意思是引龙回来降服百虫。三月三为上巳节,农民上土谷祠祭神,祈求本年五谷丰登,



人间大爱的珍视呵护,从而体悟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观。人们也重视中秋节,“月到中秋分外明”,把月圆当做团圆的象征,把农历八月十五当做团圆的日子。千家万户头顶清辉,围坐一起,祭月、赏月,吃月饼,话旧叙新,沉浸在无限的天伦之乐之中。远在异乡的游子,“抬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借明月寄



钱穆在谈论中国文化发展问题时指出,中国文化乃由中国民族独创,故其文化演进,四五千年来常见为一脉相承,传统不辍。他引用《易经》“可大可久”的观点说明,中国文化开始就摆在一个大局面上,经历绵延了很长时期。中国民俗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部分,“成为此体之一种根茎,渐渐生长而圆成”。可以肯定地说,民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根基,它关乎普通人民群众生产生活过程中所进行的一系列物质的、精神的文化现实,它有广大的生活应用意义和影响人生的审美价值。



的精髓,又突破了塔楼建筑的常规,堪称中外建筑中的杰作。

钱穆在谈论中国文化发展问题时指出,中国文化乃由中国民族独创,故其文化演进,四五千年来常见为一脉相承,传统不辍。他引用《易经》“可大可久”的观点说明,中国文化开始就摆在一个大局面上,经历绵延了很长时期。中国民俗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部分,“成为此体之一种根茎,渐渐生长而圆成”。可以肯定地说,民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根基,它关乎普通人民群众生产生活过程中所进行的一系列物质的、精神的文化现实,它有广大的生活应用意义和影响人生的审美价值。



李善长笑了,他问大儿子:“你还说李家庄的人可恶吗?”

大儿子挠着头,嘿嘿笑着:“上次是挺可恶的,这次怎么这么友善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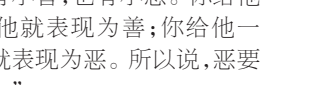
李善长说:“大善大恶的人,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都和这李家庄的村民一样,是些普通人,既有小善,也有小恶。你给他一个善的契机,他就表现为善;你给他一个恶的契机,他就表现为恶。所以说,恶要原谅,善要引导。”

李善长又问大儿子:“你把一担桃子丢在树荫下不管,还怪别人来偷吗?”

两个儿子听了,恍然大悟。

每个人身上都既有善的种子,也有恶的花,但最终结出什么样的果子,关键要看你给他一块什么样的土壤。一个团体管理者,最大的责任,就是要完善体制,尽量为人们提供向善的环境,减少为恶的机会。

二儿子千恩万谢地回到了家里,把经过告诉了李善长。



李善长笑了,他问大儿子:“你还说李家庄的人可恶吗?”

大儿子挠着头,嘿嘿笑着:“上次是挺可恶的,这次怎么这么友善呢?”

李善长说:“大善大恶的人,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都和这李家庄的村民一样,是些普通人,既有小善,也有小恶。你给他一个善的契机,他就表现为善;你给他一个恶的契机,他就表现为恶。所以说,恶要原谅,善要引导。”

李善长又问大儿子:“你把一担桃子丢在树荫下不管,还怪别人来偷吗?”

两个儿子听了,恍然大悟。

每个人身上都既有善的种子,也有恶的花,但最终结出什么样的果子,关键要看你给他一块什么样的土壤。一个团体管理者,最大的责任,就是要完善体制,尽量为人们提供向善的环境,减少为恶的机会。

二儿子千恩万谢地回到了家里,把经过告诉了李善长。

点将台 老鲍谭古(29)



手段的正当性

□ 鲍鹏山

《论语·里仁》: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以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以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有钱和有权,这是人们所想要的,不用正当的方法去获得,君子是不会安处其中的。穷困和卑贱,这是人们所厌恶的,不用正当的方法去摆脱,君子是不躲避的。

君子与小人之区别,不在于爱财不爱财。物质上的享乐,是人的生理需要,君子与小人的生理构造是一样的,所以,对于享乐的爱好,也是一样的。

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只在于实现爱好达成欲望的手段不同。君子爱财,不仅爱之有节制,且取之有道;小人贪财,不仅贪得无厌,且不择手段。

《论语·述而》: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不正当得来的富贵,是不吉利的,是不长久的,如浮云一般,易聚,更易散。所以,面对这样的富贵时,不贪求,不垂涎三尺,而是像面对天边的浮云,毫不动心。这“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真是大潇洒,有此大潇洒,方有大自在——一种脱钩之鱼般的自在。孔子说这话时,是深感这种大自在的。

其实孔子一点都不自命清高并以此自诩人。他从从不贬低常人的欲望以及对此欲望的孜孜以求,更不否定欲望的满足带来的快乐。他只是不断提醒我们:见得思义。《论语》中,孔子和子张都说过“见得思义”的话(见《论语·季氏》、《论语·子张》),子张当然是称述并奉行孔子主张的。“得”是目标,“义”是所得之物的正当性和手段的正当性。

坏人往往不是由一个坏目标造成的,而是由一些坏手段造成的。想发财,不是坏人,用侵占不当财产的方式发财才是坏人;利己不是坏,损人以利己才是坏。

同样,判断一个人是否好人,往往也不是看他有无实现某种道德目标,恰恰相反,常常倒是看他采取何种手段来实现他的目标。

假如他因为不屑于采取不道德之手段,而最终失败,他不仅是好人,而且,他之所以是好人,恰恰是因为他的失败。很多时候,失败才能成就光荣,其极端的境界,就是——杀身以成仁。

对于财富,孔子还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财富如可求,当一名手拿皮鞭的市场守门卒,我也干;如不可求,我还是从吾所好。你看,孔子真的不唱高调。财富很重要,可财富也不是那么重要——通达而不矫情。

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的“可求”与“不可求”,不是从能力上着眼,而是从手段上着眼,且手段之弃取,不在高低与贵贱,而在正义与不义。当然,对于孔子来说,“可求”与“不可求”,还是从职责上着眼:他有自己的“天命”:他必须选择一种与个人财富无关的职业或义务来作为自己终身的事业,这也是他之所好——那就是传承文化,使斯文不灭。有了这样的绝大使命,哪里还能心有旁骛?财富当然就“不可求”了。